

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王义桅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出现理论终结与庸俗化的倾向。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到了追本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时候了。从回答“国际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文章反思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维度问题(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国际关系是人的关系与社会关系在国际层面的呈现,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终究是人的学问,对国家的抽象不应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当西方神话被中印共同崛起为代表的亚洲崛起打破时,这将还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性;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 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7)04 - 0019 - 07

一 引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果说以前存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够的问题,那么现在的学者们急于填补空白、呼吁与国际接轨,却有了过度“繁荣”之虞。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与国际接轨,以至于失去自我。其结果是,国内的繁荣并未激起应有的国际反响。追本溯源,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虚假繁荣是与它日益表现出的先天不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的共同表征是理论的庸俗化和对理论的终结企图。

先说理论的庸俗化。笔者曾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多元,难以一概而论,但总体而言仍是一种庸俗的理论,是在以辩论代替革命、以西方代替国际并围绕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进行的,将1500年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进程假定为必然,具有浓重的线性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情结。在理论的表现上,常常是观

念创造理论,有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嫌。在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对其个别论点或涉及对中国有偏见的部分加以驳斥,评介几乎是仰视的,缺乏整体性、俯视性批判。

由于存在这种先天不足与实用主义倾向,时至今日,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和科研中形成了一种潜意识——论文一定要有理论,理论自然就是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西方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再次庸俗化的

* 本文系笔者递交给“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2006年度青年研讨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2006年10月28~29日)的论文。感谢会议评论人苏长和及其他与会学者的批评建议。论文初稿还先后得到任晓、时殷弘、张文木、于滨等学者的指点和鼓励。以王缉思为代表的前辈的勉励是笔者努力创新的不竭源泉。《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批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秉承“片面中追求深刻,思想性高于学术性”的理念,文章虽存在“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问题,但不足之处均由作者负全部责任。

参见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4~10页。

表现。问题是,理论与分析是什么关系?分析一定要有理论吗?理论一定有思想吗?国际关系理论是什么理论?依笔者看来,它至少不是终结理论。理论阐述与理论思维的区别何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用了什么理论?如果要细究起来,它应是双层博弈(two level games)理论运用的典范,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才不会在乎西方的所谓双层博弈说。其实,理论的魅力在于逻辑。种种泛理论、唯理论的倾向便是理论的庸俗化。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终结企图与中国学者的终结冲动。笔者注意到,近年在中国的理论刊物上,不断刊登这种言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就总体而言不外乎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且不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单说建构主义,其在中国受到的热捧程度远甚于西方,以至于言必称建构主义,似乎不谈建构主义便不时髦、不了解学科前沿似的,这便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建构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固然与以秦亚青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努力分不开,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其和平发展道路上对建构主义表达国际体系的关切。问题是,建构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回归本身就是对传统理论出于抽象的需要而概念化、片面化的修正,并非什么新发现。再则,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何在?作为第一次论战的理想主义为何自动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的三大主义是否可以等量齐观?

学科发展或者说人类认识进步的循环往往是迷途知返、返璞归真,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为防止国际关系理论的庸俗化和终结化倾向,笔者提出三点建议:首先要意识到“迷”,要有迷思的感觉,这样才能意识到迷途知返。其次要坚信返璞归真,还原理论的实践基础。最后要探讨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信息流失机制,思考从国际关系实践中抽象化、科学化和理论化经验认识的代价。换言之,要深入到理论的源头,要反思核心假设的部分是否存在抽象失真或异化的现象,而不是在范式转移层面做文章——因为那毕竟是西方范式。超越范式、思考观念发展的自在规律是本文思考国际关系的理论性的宗旨。

问题还是回到根本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纵向(状态)、横向(力量)、自身(意志)维度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维度。

二 国际关系理论溯源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想当然的提法,忽视了三大问题:国一定有际吗?国际一定有关系吗?国际关系一定有理论吗?国际关系理论的庸俗化和终结化倾向在本质上即源于此。

第一,何为“国(nation - state or state - nation)”?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讲的“国”是“民族国家”。其主要组成有四大元素:人口、领土、政府、主权,但这并不适合传统非西方国际体系。比如,历史上东亚体系里的中国与朝鲜、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它们之间显然并没有领土、主权观念的区分,而只有疆域、管辖权的界定。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提法仍难被韩国等国家接受,后者甚至将“中国”等同于“汉族”。

第二,何为“际(inter or intra)”?不论是欧盟作为超国家的实践还是中美关系从双边意义拓展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已经越来越难以用“际”概括了,更不用说次国家行为体了。如果说以前的国与国关系是两点关系、直线关系、三角关系的放大,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则成为一种立体网络,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组织组成了第四空间。

第三,何为“关系(relations or co - existence)”?空谈关系是不行的,必须分解为各领域,但各领域关系只是冰山露出水面部分,水下部分的实质内涵难以用关系来概括,如政治关系 - 政治体制(外交与国家认同、亲密程度的不一致)、经济关系 - 经济基础(外贸与内生经济的脱节)、文化关系 - 宗教的纽带(中印文化关系强调佛教的影响,但佛教已不再是印度文明的母体)以及军事关系 - 军事透明度等。总之,国际已经难以概括国与国家关系的复杂内涵,关系也不是国与国作用和互动的本质表述。想当然提国际关系是不妥当的。

第四,何为“理论(theory or hypothesis/argument/approach)”?理论本身是规律性的认识,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多是指一种认识体系。国际关系理论常常以“主义”的面目出现,其实更多的只是某一学说、假

许多学者(如王缉思提倡用“国际政治”,俞正、蔡拓等倡导“全球政治”提法)已经在突破国际关系的思维框架。

设或言论,笔者认为须做以下四种区分:(1)大(宏)理论:系统、普世性的阐述(如马克思主义那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2)范式:各种流派/主义便是范式的表述方式,和中文里的学派、主义不一样,因此“ism”不能简单翻译为“主义”;(3)学说: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如果有什么国际关系理论的话,均势论就是”,其说的就是均势说;(4)假说: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等,因为本身就是假说,需要证实或证伪。

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是塑造西方自1500年以来霸权合法性与优越地位的历史枷锁,工具理性有余而价值理性不足,本身绕开了三大根本性问题——国一定有际吗?国际一定有关系吗?国际关系一定有理论吗?自然也不能回答随后递进的三大根本性问题——国何以有际?国际何以有关系?国际关系何以有理论?有鉴于此,赵汀阳先生指出,马丁·怀特提出的“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质问是个伪命题,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世界理论”,因为“目前的世界仍然只是个‘非世界(non-world)’,它只是地理存在,而不是个政治存在”。

三 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质疑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要否定这一概念,而是为了探讨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即理论域或曰理论的边界问题。没有理论域的概念,便不会有理论的真正创新和进步。相反,理论的真正创新与进步同时也是不断厘清理论域的过程。在使用国际关系理论提法时必须明白以下三点:

(一)国际关系提法的失真

国际关系提法的失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将国与国关系用抽象的主权区分开来,造成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忽视国际关系也是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忽视头顶上的星空等无形法则约束(其实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夸大西方、忽视主观能动性建构,导致把政治、经济、军事区分开来,把文化视为力量。

2. 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大国中心论,在西方强势话语前就是被西方表达的国际关系概念,这又与西方中心论密切联系在一起。

3. 国际关系倾向于把国家视为因变量,忽视社会流动。如英国学派提倡国际社会,可是未被同化、社会化;那些没有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团体和势力又该怎么办?所谓失败国家,显然是以西方国际体系下的成功国家为参照系的。忽视国家的自身维度和社会流动也会导致霸权国挟“国际社会”以令“各国”;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纳闷,美国为何一个(国会)唱白脸,一个(白宫)唱红脸?原因就在于我们把美国视为铁板一块的国家而非多元社会。

4. 国际关系把正常的存在方式牵强地扯上所谓的关系,庸俗化、主观化客观存在。比如,美英特殊关系就是过于政治化的提法,这种提法虽然重视两国历史文化渊源,但忽视了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多与海上霸权国为伍的经济基础。另一种情形是过于疏远的关系,如蒙古与加纳,除了同为联合国成员国外,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5. 国际关系只是冰山的一角,正如国际新闻忽视沉默的多数,注意的只是显象,忽视了潜规则。两国没建交就没关系吗?作为全球大家庭一员,一定肩负着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在联合国等框架下进行不自觉的间接合作,说它们没有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就算同为联合国成员,却不能套用国际关系概念,比如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同为联合国成员国却互不承认,笔者认为双方更多的是民族内部关系。

(二)国际关系分析的代价

西方政治话语首先思考的是“你是谁(who are you)?”问题,也就是身份问题,旨在区分和制造敌友,探询“我们(us)”和“他者(others)”,是一种割裂的世界观。而中国政治观思考的前提是“我们是谁(who are we)?”最终得出了四海一家的概念,产生了天下和谐的世界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中美学者在讨论两国关系时常常为“美中关系”还是“中美关系”的提法争执。因为平时各国都把自己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或显眼位置,思维逻辑也是“自己是哲学,人家是意识形态(we are philosophy, you are ideology)”。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国际关系超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参见王义桅:《塑造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4~21页。

表 1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属性

理论	理论客体	理论主体	理论指涉	理论取向
国际关系理论属性				
科学性	普世性法则	国际哲学家	合理性(规律性)	必然性
艺术性	外交艺术	外交家	合法性(人文性)	偶然性
理论性	自我实现的预言	理论家	合目的性(通约性)	偶然中发现必然

脱国内关系,而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平等(不同国家维护其主权的能力不同)这一“应然-实然”的悖论。

(三)国际关系思维的实质

国内与国际的二分法(dichotomy)是国际关系思维的实质问题。为什么美国强调国际关系,忽视世界政治尤其是忽视国内政治?这源于美国式的二分法:国内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纷争不断,只有处于力量与道义制高点的强者才能领导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的提法是美式二分法的产物,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要研究美国,研究美国所依赖的西方文化哲学。尽管用词相同,但它们的内涵或偏好与我们有差异(比如权力的达尔文式理解和以德服人的文化差别)。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在中西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理解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之,国际关系就关注那么点“关系”,它忽视了国家间的宏大背景和实质的异同。与其等以后还原,还不如一开始就返璞归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为此,必须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性的四大问题:

1. 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论化?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抽象成普遍主义的命题,在不失真(可还原现实的)前提下可以理论化。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原则忽视了规则卷入的不平等。国际关系理论,即便是批判理论,终究没有或并不愿意超越这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悖论。

2. 如何理论?笔者曾提出同化-异化-原教旨化的三段论。所谓“同化”,即各理论从泾渭分明到不断通约,在融合中展示自身特质,获得现时代的合理性;所谓“异化”,即理论发展过程中既有不断肯定自我的过程,也有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以获得现时代的合法性;所谓原教旨化是指理论一旦形成,都具有原教旨倾向,即不断否定对立面来肯定自身,获得现时代的合目的性。

3. 理论结果如何评估?对此,笔者曾提出理论的

属性乃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是真理的一元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的辩证统一。评判理论的维度有三个条件: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即理论不免带有提出者的个性及其文化特质影响,同时还反映出相应的国家关怀,揭示或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矛盾。

4. 理论如何回归现实?笔者认为,国权应还原为人权,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样,终究是人的学问。对国家的抽象不应以人的主体性丧失为代价。在美国霸权的阐释上,美国标准/美国神话放大了美国力量,使美国霸权成为一种想象的霸权。总之,国际关系理论的属性可以概括如表1所示。

相应的,国际关系应分解为三个层次概念:世界政治、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当然,这首先以国内政治分析为基础。美国高校一般没有国际关系系,而是分别属于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或地区与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等部门,因为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分支,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

说到国际关系的理论性,不得不分析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或曰美国化问题常常表现为美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显性或隐性贡献。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化包括四个层面:

1. 普世化——把美国的说成是世界的,所谓“国际社会”的提法是典型例子。有鉴于此,学者们越来越不用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概念而改称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实用化——把世界的说成是美国的,认为美国的国际研究比较好地实现了理论、战略及政策三位一体的结合,价值则蕴涵于其中。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译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22~41页。

3. 西方化——把西方的说成是美国的,美国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自称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天然假定美国是古希腊-古罗马遗产的继承者。

4. 真理化——把发现的说成是发明的,进而混淆提出理论还是发现理论的区别,把变革说成革命。美国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其评价与淘汰机制为这些刻意求异的辩论大行其道。

上述似是而非的提法都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性的体现。比如软实力理论强调“说服”而非“强制”,其实只是纠正了西方政治学对权力的达尔文式定义。这在东方式的、强调以德服人的权力内涵本位看来,不过是常识性认识。

1991年,亚当·罗伯茨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将这一点推到极至。当然,本文并不是去责怪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而是提醒我们要如何认识并避免之,并认真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是以美英理论为载体的全球化时代理论,还是本质上就是美国强权的霸道逻辑?这其实是理论形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

四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相比美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隐性和显性贡献而言,中国学者的心态多半是羡慕的,也是急躁的。自我反省的结果便有了“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想当然的问题,带着某种“技不如人”的潜意识来思考国内学者、学术和社会环境乃至文化的缺陷,似乎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件丢人的事。

笔者参加了2006年度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巴里·布赞和阿米塔·阿查亚在会上共同发起的“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小组讨论,笔者领

会到所谓“为什么没有”的提法其实是一种霸道、歧视性质问。正如我们对西方人发问——为什么你吃饭不用筷子?对方一定会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用筷子呢?刀叉不是挺好的吗?因此,在讨论时笔者大胆发问——为什么要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我们有哲学和文化呀!孔子不是理论家,是思想家。没有文化的国家才会去搞什么理论。当时举座哗然,纷纷感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威力”。弄得笔者哭笑不得。每当戳到西方人疼处,他们便妖魔化、负面化你,给你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

虽然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但这并不能说明理论是西方人的专长,因为的确存在东西方的不可通约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自1500年以来,世界历史一直处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阶段,所谓现代国际关系肇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述便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提法。以西方要求东方的结果便是自我的他者化——以西方表达东方,如此便永远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的话语霸权在国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中国人刚到韩国时,特别不习惯喝凉水、饮咖啡,于是向韩国朋友抱怨——韩国怎么喝凉水呀?怎么那么喜欢喝咖啡?怎么那么多教堂?韩国朋友听了很纳闷:你的问题让我们莫名其妙——潜在逻辑是,韩国应该是中国化的,怎么忘本了?这主要是由于在我们的脑海里存在华夷体系的情结,或难以摒弃的中国中心论的思想。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抽掉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回归理论的文化内涵。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化倾向和西方中心论逻辑不过是再现了理论是权力(硬-软)的婢女这一古老事实:一则古

这段文字转引自袁明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名著系列”系列丛书所做的总序,2002年10月。

如此发问由笔者肇始,其他学者后来也有探讨。参见王义桅:《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1~22页;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6~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参见王义桅:《与韩国交往,谦逊比实力重要》,载《环球时报》,2006年3月6日。

代中国没有国际概念,甚至国的概念天然与家联系在一起,何来国际关系理论?二则现代中国被迫同化进国际体系过程,何来自己的理论?三则未来中国建构东方新秩序、表达自我当有理论,但绝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便是世界之中国化的阐释。

反思我们为何没有理论而西方为什么有理论,在秦亚青的分析基础上,笔者将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区别于下,说明已有理论的所以然(如表2所示)。

表2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之比较

理论流派	理论内容	旨趣	思考原点	指向
美式理论		霸权呵护	国际社会	实然
英式理论		帝国遗产(情结)	殖民体系	未然
北欧、拉美理论流派		反抗-平等诉求	中心-边缘体系	应然

笔者对照已有的理论流派,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外乎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西方背景模式。表现之一是成为西方市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有风吹草动,国人便争先评介,其实是为美国买单,学习成本高昂自不待言。表现之二是被动求同。无论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研究,还是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等都没有能超出西方话语霸权的范畴。言下之意是你有我也有,或应该有。还是在跟人家比,就没有毛泽东当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种“我不和你玩”的底气。表现之三是主动求异,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提法便是相对积极地表达自己、表达世界,避免落入西方理论圈套的体现。

第二,刺激-反应模式。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人道主义干涉论、有限主权论、中国威胁论、新帝国论等一经传到中国便遭到国人的批评。这种情形的出现仍然是美国提出话题,中国被动应战,往往不得要领,所以对方也根本不在乎。

第三,新范式塑造,就是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性来试图塑造新的国际政治范式。

以上三种模式对应于中国的三种角色分别是:(1)开放世界(对世界开放)——西方的普遍价值;(2)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全球化;(3)表达世界(塑造世界)——中国化。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实是对处于变化中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的

折射,尤其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发展趋势:仰视西方 侧视西方 远视西方 俯视西方 平视西方。这样,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解渴 解惑 解释 解决 解构 解放。

五 结论与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反思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其实也是为了梳理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笔者把它概括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元素。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元素可以归纳如下:(1)作为因变量的权力——现实主义对客观世界的描述集中在国际关系主体的“权力”内涵上;(2)作为约束条件的秩序——自由主义通过分析国际关系客体的“权利”,试图架起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桥梁,从而形成权力与权利一定组合的国际秩序;(3)作为自变量的道德——建构主义侧重关注主观世界,通过彰显主观能动性的道德关怀,试图实现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和权力与权利的统一。

总之,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方程式,企图实现自变量、因变量以及约束条件的三位一体,但在实践中往往会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成为主义、流派以求得自身的身份。这是美国学术制度求异存同的竞争规则促成(与职称评定、学术基金运作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美国人勇于进取、标新立异的喜好有关,但也蕴涵着美国理论的霸权逻辑与悲剧下场。

概言之,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延续。当今的国际政治观念仍然建立在西方话语霸权基础之上。相应的,所谓国际关系理论是从思想观念上强化西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地位与霸权的合法性。指望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削足适履,中了

表2参考了秦亚青:《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Yiwei Wang, "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 in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Geocultural Epistemologies*, chapter 3, London: Routledge 2007.

有学者认为笔者又落入前文所批评的圈套——三大主义的提法。应该承认,这只是一种无奈的巧合。

西方的圈套。因为真正的理论是没有所谓国别特色的。企图保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要彰显中国的价值关怀,并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而只是在包装和传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韩国去汉化、追求本民族文化特色一样,其实就是变相宣扬中国文化的影响,默认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越性。正如韩国去汉化的努力只不过为了挣脱这种束缚,强调现在韩国文化的正统性、合法性。相应地,中国学派的提法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界分一杯羹,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面貌来实施自我奴役,甘愿被西方所俘获。笔者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西方学者也的确在试图将非西方的理论变成其理论的殖民地,如果不能,他们便指望俘获我们的思想,以普世化的学术压抑我们的创造、奴役我们的心灵。

这样,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和批判不只是简单的去美国(西方)化和实现中国化问题,而是反观国际关系理论自身,思考其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以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正本清源与返璞归真,即国际关系返回自然、自在状态,彻底超越自我实现的预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并不因为上升至国际层面而有所改变。国家并非国际关系的真正主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主体仍旧是人。一句话,国际关系是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在国际层面的呈现。国际关系学本质是人学,而非西方所谓的国家学说。

西方的话语霸权已经窒息了我们的自信,以至于非得用西方的话语表达东方的历史智慧——“仁义地缘”的提法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见物不见人的——即便谈及人,主要也是领导者、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和纵横捭阖,舆论和民意在战争时期更只是一种点缀。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范式。西方殖民者曾将自己(西方人)作为目的,而把异己(被征服者)作为手段,既反映出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又展示其自欺欺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反观中国,从思考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实践领域可以看出,中国崛起既非恢复天下主义,亦非推翻西方秩序。中国外交从实践上诠释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它既不会创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也不会创造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相反,只有当依托于亚洲崛起的中国发展打破了西方神话时,才能还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有文化且善哲学,而不必苛求理论。这是东西方有关和而不同的历史观、世界观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必囿于国际关系,应更多思考世界的主要矛盾和时代发展趋势等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用中国式思维展示人类智慧,不能只停留在以中国方式、中国关怀表达世界的层面,而应首要思考世界的普遍问题、人类普遍性关怀,只不过这种问题和关怀恰巧由中国学者所发起而已。一句话,要有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应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中国的发展与印度的崛起已经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深层思考。他们不再是简单地看到了东方的崛起,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整体衰落。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和印度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正在宣告,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印崛起的效应在于彻底埋葬殖民体系以来的西方神话,纠正西方化、美国化的单向度全球化航线,开启了真正的多元化时代。

[收稿日期:2006-12-18]

[修回日期:2007-03-06]

[责任编辑:赵远良]

参见王义桅、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第17~23页。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150~151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Abstracts

Reconstructing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Wang Yizhou (6)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s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LS) should be re-shap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China's need to cope with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to accept responsibilities in conjunction with global trends. It concludes that worldwide changes within and outside IR and LS are working to curb government arbitrariness,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criticize various hegemonies.

Structural Strategic Capability: Intention, Sourc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ang Yongsheng Tong Mingxiang (13)

In recent years, strategic cap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searc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ource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essential strategic capability and structural strategic capability. Of these two kinds of capability, the latter new concept is the outcome of viewing strategic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tructure. The sources for structural strategic capability are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tructure, and can be seen as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tructure on the inner functional realms of countries. The promotion of a structural strategic capability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capabi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will provide favorable support for the design of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ang Yiwei (1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both the West and in China, have shown the tendency of reaching a final stage and becoming vulga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now time to trace back their sources and to reflect on their subjectivity. By answering three basic questions: "do states have boundaries?", "does the international have relations?", and "d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theories?", the author reflects on the dimensions of IR theories, i.e., the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nalyzes the congenital weaknesses and ultimate incl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 author also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human rela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ike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 human knowledge, i.e., a kind of study about humans. The abstraction of the nation should not come at the cost of losing human subjectivity. Chinese diplomacy expounds upon the theo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ractice. Such practice will neither promote the Sinification of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nor create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r a so-called Chinese school. Rather, when the Western myth is destroyed by the rise of Asia through the co-rise of China and India,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finally will be restored.